

思想

利益集团图谋操纵经济决策

——盛世危言之民生篇(三)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各国研究腐败现象,大体而言把腐败分为两大类: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 corruption)和收买型腐败(venal corruption)。体制型腐败的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寻租,并利用寻租巩固、加强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

在当今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业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业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

价的扶摇直上,也制造出许多房地产大亨。非常近的案例还有,在外资企业的长袖善舞下,“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在去年3月的“两会”上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挫。

权力位更高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本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寻租,并利用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至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拍挂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业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业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

地产大亨。非常近的案例还有,在外资企业的长袖善舞下,“两税合一”的议案没能在去年3月的“两会”上付诸表决,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努力再次遭挫。权力位更高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本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寻租,并利用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至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03到2004年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期间,各地通过自查,发现超范围划拨供地2695件,涉及金额6.3亿元;违规低价出让土地2065件,涉及金额4.3亿元;擅自减免土地出让金3108件,涉及金额21.6亿元;欠缴土地出让金14355件,涉及金额225.9亿元;应招拍挂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业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业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

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所作的调查显示: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只有20%到30%留在乡以下,其中,农民的补偿款占5%到10%;城市政府拿走土地增值的20%到30%;各类城市房地产公司等,拿走土地增值收益的大头,占40%到50%。说穿了,房地产暴利是形式合法外衣之下的实质上的不当得利。

在这些违规数字的背后,是我们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得知的官员权力腐败导致的灰色收入以及房地产商的暴利。如2005年福州市公布的房价清单显示:福州市市区商品房平均开发成本约为每平方米2160元,社会平均利润约为每平方米1400元,地价、建安成本、配套设施费用分别只占房价的20%、25%和14%左右,而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利润则占到房价的41%左右。这份公开披露的福州市部分地块商品房价格成本对照表进一步显示,在所列的23个楼盘成本目录中,商品房开发成本从每平方米1636-3094元不等;销售均价从每平方米2500-5500元不等。经测算,开发商的利润率平均约为50%,最低的约为20%,最高的超过90%。其中利润率超过50%的楼盘有10个,呈现出楼盘越高档,利润率越高的基本特点。

除房地产外,自然垄断资源内的权力资本化现象也非常普遍。最触目惊心的便是整治官煤政治所挖出的一个看起来深不可测的黑洞。去年,我国曾连续发生大规模矿难,使官煤勾结的隐性秩序得以曝光。然而,随后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表明,正是官煤勾结的利益链,形成了腐败包庇违法,违法酿成事故,事故最终造成矿工死亡的“矿难逻辑”。尽管“撤资

令”已经用“既往不咎”的原则做了事先的让步,然而在官煤勾结最肆无忌惮的地方,主动撤资的为数寥寥,甚至有官员居然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于是,许多省份不得不将最后期限一再延迟。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之下,各地陆续报上了“撤资”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说令人振奋不如说令人失望,在一些地方则传来“明撤暗持”的消息。从“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放言中,大家可以看到,对那些参股的官员而言,已经不再将乌纱帽当作是受益,而是看作了其参股煤矿的一个机会成本而已。这再清楚不过了,官员参股的受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官带来的总受益,已



已经到了为此不惜一切的地步。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福利水平也要远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可避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到了为此不惜一切的地步。

权力与资本的结盟,造就了行业性的暴富,造就出部分接近权力的人群的暴富,同时官员们由于种种灰色收入的存在,实际享受到福利水平也要远远高于显性的货币收入,从而拉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生活水准差距。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不可避免成为权力以及权力与资本结盟的牺牲品。如此一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是在所难免,并且不可能因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二次调节而得以消除。

(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

识小录

从大市场到神经元

——史密斯的实验经济学

近日要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之一是“实验经济学”,现在它已与博弈论、社会选择理论还有演化理论牢牢绑在一起,成为非常主流、非常热门的学问了。

往前倒数几年,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内学界一片愕然。绝大多数人都还没听说过“实验经济学”。媒体找了很愿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采访,可谁也没能说出个大概。实验经济学离开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实在太远。

前阵早就告诫我们,经济学是不能进行实验的。对人口政策做些微调,就可能造成百万至上千万的人口波动;对利率、汇率做出调整,则动辄会有数以千万的资金改变流向;对经济体制的调整甚至可能动摇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调整的代价太大,再富有的国家也经不起经济实验的折腾。

可我们实际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往往就是做实验。很多政策出台,只是出于领导的主观判断,并没有充分考虑百姓对它的认知和理解。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同样一个事件会有不同看法,没有一个能完全料准别人的想法。经济学家从来不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真实市场成为最大的实验室,代价往往惨重。

20世纪初,美国哈佛出了个天才经济学家叫张伯伦。中国经济学的奠基人陈岱孙先生是他的同学。毕业时,大家竞争优秀论文奖励,陈岱孙远不敌张伯伦。陈岱孙的论文《麻省地方政府开支与人口密度的关系》考证严密,资料翔实,下的功夫极深。可张伯伦的论文思想更深邃,眼界更开阔,这远非单纯用功所能企及的了。当时张伯伦已敏锐地觉察到,真实市场不会完全地自由流动,自由竞争,但对立面完全垄断的情况也不多,往往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他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垄断竞争理论》,就分析这两者之间的情况,震惊学界。现在教科书里都写入他的这种思想,可是市场到底是偏向完全竞争还是偏向垄断,如何计算,人们的行为又有什么差异,一个个问号至今仍困扰着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史密斯是张伯伦的学生。50到60年代,哈佛作为美国思想中心,培养出一大批有自己特点的学者,史密斯是其中一个。据说他当时性格谨严,平时着装一丝不苟,研究问题也是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他听了张伯伦的课,深感市场失



梁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灵程度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决心用更科学更严格的方法来解决它。

张伯伦和史密斯都想用小范围实验的方法来检验人们对市场的行为,从而确定市场的有效程度。史密斯从60年代开始做这样的实验,一做就是40多年。

史密斯最先制定出实验经济学的框架,最先提出大量经典实验的构想,并最先通过这些实验得到很多重要结果。可是他的工作迟迟不被学界承认。主流学者看来,经济学近百年来来的根基就是一个假设,“人是理性的”。如果人的真实行为与理论模型相悖,那只能是人的行为出了问题,不可能动理论本身。

就这样,史密斯在亚里桑那那大度过人生的大半岁月,2001年转到了乔治·梅森大学。他坚信实验并不是动摇经济学,只是对“理性”这个词做出更深刻的理解。而且,随着医学条件的进步,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fMRI)来研究人的思维决策的成本已经降低到可接受的范围。这样,用这种新技术来做实验,更微观地研究人类思考行为变得可行,产生的这门交叉学科被称为“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史密斯是这门新兴学科最坚定的支持者。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获奖了,一下子成为学界的红人。史密斯在200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和北京作了好几场演讲。我见到他时,已是一个耄耋的老人,但留着长发扎在脑后,戴上墨镜,模样很酷。

他为人谦逊,不愿多讲他赖以成名的实验经济学研究,也许他觉得那已是过去;也不愿多讲他正在推动的神经经济学,也许他觉得那还太新,很多结论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在中国大谈哈耶克,谈市场经济自然有力的演化过程。虽然他远比其他学者更“科学”地研究单个人的行为,可他坚信自己无力根据研究成果来设定经济制度。他一辈子在研究市场的缺陷,可最终却承认,这些缺陷无法弥补,“看不见的手”会协调这一切。市场本身的力量是最不可思议的。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四))

边上人语

赶快给狼解下套子

袁东先生在本版的一篇《中国狼何日驰骋世界》(2006年8月29日),文采文思俱佳。受袁文启发,在下今天从另一个角度,谈谈中国狼何以驰骋世界的问题。

中国的企业狼之所以在世界草原上缺乏生存力、竞争力,最关键最重要最首先的原因,不在企业狼自身,而在企业狼自身之外,是外部环境制约了企业的狼性的自由发挥。这种制约企业狼性自由发挥的外部环境的存在由来已久,它不光限制了狼的驰骋,也限制了狼的天性的自由发挥。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曾有一个实验:大铁笼子里关了5只猴子,主事者放进一挂色香味俱佳的香蕉去引诱,其中一只猴子首先出手去抓。此时,实验者迅速开动高压水枪,不光冲击先下手抓的猴子,那只尚在观望的猴子也受到了攻击。过了一段时间,又一只不甘寂寞的猴子试探性地蹑手蹑脚来到了香蕉下面,但不等它伸手上举,高压水枪再次发威。几个回合下来,5只猴子都变得规规矩矩了,眼睛看着它们口水大流的香蕉,强迫自己安静下来。这时,主事人拉出一只毛淋淋浑身发抖的猴子,又换进来一只新猴子,这个不谙笼情的小伙伙一进笼子,就直奔香蕉,这时,一个料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4只受尽惩罚的猴子一拥而上,竭力阻止它接近香蕉。一段时间后,高压水枪已弃而不用,但管制效应依旧存在,笼内的5只新猴子面对香蕉,谁都不敢冒失造次,虽说新进入笼子的猴子都未领教过高压水枪的厉害,却一只只循规蹈矩,成了自觉守法的群体。

这个实验正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一个分析模型。在这个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环境中,由于管制,本来具备齐天大圣潜质的企业猴变成了无所事事大老千的驯马,活活好动、好吃敢做的猴性退化以至丧失殆尽。在上世纪90年代,伊拉克人入侵科威特时,各国各地各种肤色的大大小小的商人,便如蝗如蜂飞向海湾,其中有几个来自日本某生产安全套的厂家。原来,日本人经过调查,发现美国大兵被海湾地区的风沙搞得不胜其烦,因为沙子很容易钻进枪械里,于是精明的日本人就极力向美国

科威特时,各国各地各种肤色的大大小小的商人,便如蝗如蜂飞向海湾,其中有几个来自日本某生产安全套的厂家。原来,日本人经过调查,发现美国大兵被海湾地区的风沙搞得不胜其烦,因为沙子很容易钻进枪械里,于是精明的日本人就极力向美国

科威特时,各国各地各种肤色的大大小小的商人,便如蝗如蜂飞向海湾,其中有几个来自日本某生产安全套的厂家。原来,日本人经过调查,发现美国大兵被海湾地区的风沙搞得不胜其烦,因为沙子很容易钻进枪械里,于是精明的日本人就极力向美国

彼岸

成功的真谛

上月以94岁高龄辞世的拜伦·尼尔森是美国高尔夫球界最伟大的球手之一。他在几年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希望人们最终记住他这个人,而不是他在高尔夫球上的成就。对于他这样的高尔夫巨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愿望。

尼尔森出生于1912年,那一年,在美国出生了三位伟大的高尔夫球手,尼尔森就是其中一位,另外两位是Ben Hogan和Sam Snead,更有意思的是,尼尔森和Hogan的老家就在得克萨斯州相隔30英里的地方,他们俩少年时一起在Glen Garden高尔夫俱乐部当球童,有过相互的比赛,后来,他还成了美国职业高尔夫球比赛的竞争对手。加上同时代的Sam Snead,他们造就了美国高尔夫球史上最著名的三人的时代。在1946年的一次美国职业高尔夫球赛中,尼尔森、Hogan、Sam三人分别列前三名,那是三人时代仅有的一次顺序排名。

长期以来,高尔夫被认为是富人的运动,可那是对高尔夫作为休闲运动的误解。至于许多职业高尔夫球手,他们却并非出生于富贵之家,尼尔森他们就是来自贫寒的家庭。他们在高尔夫俱乐部当球童,为富裕的俱乐部成员背球杆,天赋以及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和苦练使他们成为了一代职业高尔夫球手。当今美国的一些著名职业高尔夫球选手都有自己的专车,而尼尔森他们当年却不得不开着自己的破车奔波于赛场之间。有一次,Hogan的车抛锚了,只好搭了尼尔森的便车。尼尔森还经常带着自己做的三明治去参加练习和比赛,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俱乐部的餐厅买午餐。有一次,一位记者拍下了尼尔森坐在草地上吃自制的三明治的情形,那是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被收入了尼尔森纪念馆。

相比别的运动,高尔夫球手的职业生涯非常长,可尼尔森却在34岁通常是事业大腾飞的时候突然宣布退出职业比赛。为什么?原因简单得有些好笑:尼尔森在开始打职业高尔夫挣钱时有一个愿望,通过职业高尔夫比赛为自己赚出一个农

场,在34岁时,尼尔森从职业比赛中得到的奖金正好买下一个农场,于是,他从高尔夫球事业的巅峰退下,去经营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在尼尔森相对短暂的10年职业高尔夫生涯中,比赛成绩是骄人的,尤其是在1945年,他获得了创记录的18个职业冠军。

尼尔森的出名,还因为另外两个大的亮点,一是他那天生优渥的挥杆,按他自己的话说:“上帝给了我最好的协调性、节奏感、平衡能力。”有人说,有尼尔森参加的高尔夫比赛,看他挥杆的优雅就足够了;二是他在比赛中温文尔雅的气质,永远那么温和、冷静,同时对周围的人包括竞争对手、工作人员、观众都是非常友好,脸上总挂着微笑。在对尼尔森众多的尊称中,真正的绅士应该比较恰当的一个。在尼尔森退出职业高尔夫后的60多年里,除了经营自己的农场,他建立和帮助了许多的慈善机构,还培养了不少著名的高球手,尼尔森杯赛至今仍是美国唯一以高尔夫球手命名的杯赛。

当今时代,人生的成功更多由事业上的成就来判断,但在尼尔森94年丰盛的生命中,事业上的成就远非是他人生成功的主体,尼尔森并没有将事业上的成就作为他的最高和终极目标,高尔夫球只是他追求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载体,这恰是过去及现在许多事业成功人士所没有悟出的真谛。

美国记者Melanie Hauser在一篇纪念尼尔森的文章中说,爱心、信仰、感恩、谦和、尊重所造就的品行,是尼尔森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人生的关键。我同意Hauser的看法,但尼尔森也并非完人,比如他一生都后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为香烟做过广告,他因而得到500美元的广告费,也许人们会问,那样的事也值得一生后悔?可那确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呀!

胡飞雷



胡飞雷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大火推销安全套,说安全套套在枪口上就没有麻烦了。美国大兵如梦大醒,于是,让日本人又着实吃了一笔战争财。反观当时中国企业,只有屈指几家灭火公司吃了一点剩菜残汤。据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国某油田灭火公司在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才赶到科威特的,仅灭了几个火井,而这几个火井,还都是扑灭难度最大,其他灭火公司不愿干的。

中国的企业狼之所以没有分到什么羹,笔者以为,最关键最重要最首先的原因正是当时的外贸管制和监督,中国企业狼出境找食抢食吃食,或是禁止,或是必须经过审批,禁止毫无道理,实属自废武功;审批似乎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可商机稍纵即逝,浪费那么长时间才给企业颁发许可证,黄花菜也凉了。

为中国的企业狼解套,最关键最重要最首先需要做的恐怕是改革进出口商检了。有研究说,目前我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约三分之二的精力是放在了出口商检上。中国的商检机构对出口商品苛刻认真,而对进口商品的商检却很宽松大量,乃是标准的厚此薄彼、“逆向歧视”。就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SK-II化妆品吧,据媒体报道,该化妆品除首次进口时有关部门检验过一次外,至今已有8年之久没有再次检验。

现今世界各国的商检,重点都是进口商品,技术壁垒针对的也是进口商品,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做出的基本选择,可以说,取消或减少出口商品检验种类是个世界趋势。即使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中,允许的或者反对的技术措施,主要也是针对进口成员的,没有哪个WTO成员国对自己的出口产品设置壁垒,给本国的企业狼上套的。目前的出口商检对我国出口竞争力应是一个极大的损害。

猴子应该吃香蕉,狼也不能带着套,这是常识,也是真理!

袁晓明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场,在34岁时,尼尔森从职业比赛中得到的奖金正好买下一个农场,于是,他从高尔夫球事业的巅峰退下,去经营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农场。在尼尔森相对短暂的10年职业高尔夫生涯中,比赛成绩是骄人的,尤其是在1945年,他获得了创记录的18个职业冠军。

尼尔森的出名,还因为另外两个大的亮点,一是他那天生优渥的挥杆,按他自己的话说:“上帝给了我最好的协调性、节奏感、平衡能力。”有人说,有尼尔森参加的高尔夫比赛,看他挥杆的优雅就足够了;二是他在比赛中温文尔雅的气质,永远那么温和、冷静,同时对周围的人包括竞争对手、工作人员、观众都是非常友好,脸上总挂着微笑。在对尼尔森众多的尊称中,真正的绅士应该比较恰当的一个。在尼尔森退出职业高尔夫后的60多年里,除了经营自己的农场,他建立和帮助了许多的慈善机构,还培养了不少著名的高球手,尼尔森杯赛至今仍是美国唯一以高尔夫球手命名的杯赛。

当今时代,人生的成功更多由事业上的成就来判断,但在尼尔森94年丰盛的生命中,事业上的成就远非是他人生成功的主体,尼尔森并没有将事业上的成就作为他的最高和终极目标,高尔夫球只是他追求人生意义的一个重要载体,这恰是过去及现在许多事业成功人士所没有悟出的真谛。

美国记者Melanie Hauser在一篇纪念尼尔森的文章中说,爱心、信仰、感恩、谦和、尊重所造就的品行,是尼尔森能够获得成功和幸福人生的关键。我同意Hauser的看法,但尼尔森也并非完人,比如他一生都后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为香烟做过广告,他因而得到500美元的广告费,也许人们会问,那样的事也值得一生后悔?可那确是一位真正的绅士呀!

求索

伊万们在经济奇迹中焦虑不安



陈宇翔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高级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

统计中的GDP虚假水分,毕竟5300与1700之间相差了3倍之多,再大的灌水也不能相差如此之大。再加上,近些年国际石油价格一路飙升和俄罗斯石油战略的大行其道,更可证实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之巨大所言非虚矣!由此,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如此庞大的社会财富究竟去哪里了呢?

很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总量的问题,而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个人财富问题。尽管俄罗斯的社会财富得到了快速增长,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算术平均财富水平也一下子飙升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实中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增长。理论上讲,现实世界中的财富水平是随机分配的,并不严格按照平均分配的规则。当然,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不需要真正按照平均水平去分配,只是我们不能太游离于平均水平线上,否则悬殊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社会陷入无穷无尽的长期冲突之中。

经历丘拜斯等自由主义先锋人物主导的“大爆炸式”私有化产权改革之后,俄罗斯社会公共财富的存量顷刻之间转移到极少数人手中,金融工业寡头掌控了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丘拜斯等人原先所勾画的蓝图也就顺利地成章地得以解决:转型改革在此也就可以结束,接下去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会在长期的改革博弈中得到慢慢的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如果俄罗斯宪法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有了这些财富资产所有权的,实际上也就拥有了社会财富增量的真实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此,俄罗斯经济权的荣辱盛衰都将与这些享有特殊利益的寡头息

息相关,而与平常的老百姓不再有多大的干系,他们的生活将严重恶化。1989年,俄罗斯改革之初还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到199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23.8%;2001年,再剧增到34%。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头号强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程度已可与世界上最为糟糕的拉丁美洲相媲美。如果在普京执政的鼎盛时期不能有效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状况,或者无法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保障,那么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大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隔离程度还将继续发生向断裂的边缘。

一些好事的西方观察家和主流报纸媒体都喜欢用美国早期的“强盗式贵族”或者“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s)来比喻俄罗斯这些新兴崛起的权贵力量。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俄罗斯国内制度的漏洞,谋取更多的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想把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国外,来稳固他们的私有财产保护。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至2001年间,平均每年从俄罗斯逃逸的资本超过15亿至25亿美元,占整个俄罗斯GDP总量的7%—10%左右。俄罗斯的这些寡头们不仅敛财,而且还有转移财富的偏好。

如此下去,即使俄罗斯有再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再优秀的人力资本,有再优良的GDP生产机器,但还是免不了为他人做嫁衣的下场,因为这些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能落到社会大众手中的越来越少。没有现期财富的改善,更没有良好未来财富增长预期,俄罗斯大众怎么会有幸福感和满足感呢?也许,沉溺在过去不好但还不那么糟糕的几许回忆之中,尚能带给伊万、娜达莎们一丝慰藉。

我们暂且不提俄罗斯经济